

治 学 篇

1

录音与倾听

陈建民，1935年3月生，广东海丰人。195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4年调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研究员。

不管是为教学服务还是为研究工作服务，陈建民主要通过录音的方式进行口语调查。录音主要有明录（公开的）和暗录（隐蔽的）两种。明录之前要跟对方说明来意，取得对方的协助和配合；暗录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不断提出新的话题，控制谈话的内容，录出来的话真实自然。

陈先生有个孩子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他的班主任通知说：孩子上课东张西望，课堂纪律不好，请家长下午到办公室来一趟。陈先生想把老师的谈话内容录下来，如果明录，对方可能不同意录，于是决定暗录，把小录音机放在对方注意不到的尼龙兜里，搁在班主任跟前，伸手一按键盘，在发话人毫不知情中把她说的话全都录了下来。录完后，陈先生说了声“对不起”，再把录音放给班主任听，她感到十分吃惊。接着，陈先生跟

她说明录音的用意是为了研究北京口语，只管语言形式，不管说话的内容和思路，她只好认可了。

但是，在室外流动的情况下，比方说录公交车上人们的交谈，录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一般只能采取偷录的办法。偷录完全是“自然录制”。偷录的办法要担些“风险”，不小心被当事人察觉，会引起麻烦。有的内容进行偷录会涉及个人隐私，使用中应格外小心。

在公交车上对人们谈话进行录音陈先生曾经搞过，虽然效果不好，但陈先生的著作《汉语口语》中有不少口语材料确是来自公交车上。因为陈先生平时留意倾听人们的谈话，并随时随地把有用的材料记下来。说到这段经历，陈先生对两三个小故事印象十分深刻。

有一次 360 公交车突然在北洼路抛了锚，孩子急着问：“怎么了，车，妈？”这是北京话二次追加的例子。“怎么了，车”是第一次追加，问“车怎么了”；“怎么了，车，妈？”是第二次追加，问“妈 车怎么了”。

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有两个老人聊天，一人问：“你娶几个？”另一人答：“我娶两个。”谈话离不开语境，其实第一个老人的意思是“你家有几个孩子娶媳妇”，第二个老人的回答是“我家有两个孩子娶媳妇”。

还有一次陈先生坐 101 公交车回家，车到沙滩站，有一个女同志带一个小男孩上车。一上车，妈妈看孩子不老实，对他说“坐坐好！”陈先生一听来了精神，因为北京口语里并没有“坐坐好”的说法，他立刻向那位女同志发问道：“你刚才说什么话？”也许是陈先生太急切了，一心想弄清原委，语气有些生硬，这位女同志吓了一跳，她瞪了陈先生一眼。陈先生立刻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便连忙道歉：“我是研究北京话的，刚才听您说了一句话，跟我研究的内

容有关。请您再说一遍，您刚才是不是叫小孩‘坐坐好’呀？”女同志说：“是啊。”陈先生解释说北京话没这么说的。于是两人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她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上海人。单音动词重叠加补语这种格式是上海口语，例如码码齐，写写好。个别北京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家庭中受到上海话的影响。（向南）

2

金有景“腌鸭蛋”

金有景，1931年生，浙江义乌人。自学成才。1954年从浙江部队直接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习和工作。80年代调民族研究所。现已故世。他在方言、民族语言等方面著作颇丰。

1956年起，金有景在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当语言学辅导员，开始结合工作中的收获思考一些问题，但是题目比较少。这个时候，他听一位老专家给年轻的研究人员作报告，其中说到，写科研文章是“两短一长”：定题目时间短，收集材料、观察研究到形成观点时间长，观点成熟后写成文章时间短。金有景受到很大启发。他想，要多出成果，就应该不断有新题目装进脑子里，脑子里同时考虑许多问题，哪个考虑成熟了，就写出来，这样就会有写不完的文章。他把这种方法称作“腌鸭蛋”，就好像不断往坛子里添鸭蛋，结果不断有腌成的鸭蛋出坛子，咸鸭蛋总也吃不完。

金有景把同一个问题的有关材料和思考的记录装在一个口袋里，一般都保持有上百个这样的口袋。就是说，他的坛子里一般都保持有上百个鸭蛋在腌着。

金有景认为，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些不是三年五载能搞清楚的问题，可以长期“腌”下去，直到搞清楚为止。（唐辰）

3

吕叔湘做编辑工作

吕叔湘（1904~1998）江苏丹阳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修读。1998年4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吕叔湘不但是蜚声国内外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1938年留学回国后曾先后担任开明书店编辑、《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78~198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1980~1985）等职。他对编辑出版工作十分关注，曾多次谈起过如何当好一名编辑。例如，1981年1月商务印书馆举办“编辑出版业务讲座”，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被邀请来讲语言问题，但他却谈起了编辑工作。1985年他也曾经谈到，“编辑一手托两家，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作者负责。”“做一个称职的编辑，据我旁观是很不容易的。”

吕叔湘主张出版物应以简洁为美，可读为贵；写文章的理想应该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他曾评改散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原文3700个字，他认为此文仍然“可以挤掉点

水”，删减一半，理由充分，条分缕析，令人叹服。

吕叔湘在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期刊和辞典编辑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40年代，应开明书店之约，吕叔湘即开始参与编辑高中国文读本，与叶圣陶、朱自清等先生共同编辑出版了几套中学国文教材。建国后，自1960年以来，吕叔湘则一直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顾问和审阅者。

在语文词典的编纂方面，吕叔湘也是成果卓著。他是我国最具社会影响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以及《汉语大词典》的首席顾问；1980~1985年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吕叔湘十分重视辞书的编纂工作，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1980）的发言上，曾说：“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他很注重词典的现实功能。例如，人们对诗文的引用，有时想知道出处，有时要核对字句，而原书通常并非随时在手边，吕叔湘由此想到“有一本引用语词典也就方便多了”。如今，我国的辞书尤其是语文词典编纂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吕叔湘先生对此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学者，吕叔湘对期刊杂志的编辑也是非常关心的。且不说他对《中国语文》所作的贡献——可以说，《中国语文》正是得益于吕叔湘先生才能茁壮成长的。对于《读书》杂志，他也十分关心。据沈昌文先生回忆，吕叔湘在一个时期里差不多每月都写篇对《读书》的读后意见，主要是指出错误。同时，他还指出该刊物应当办出自己的风格，要坚持高品位，但也应保证文章的可读性。

吕叔湘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在晚年一份自述的简历中总结自己的治学原则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既务实又创新。可以说，这也是他对编辑工作的原则。（刘英）

4

李宇明记录女儿学话

李宇明，1955年生，河南泌阳人。1981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师从邢福义教授攻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1984年获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教授，博导，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司长。他的《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是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他的这方面的研究是从记录女儿的学话开始的，把学术理想跟家庭使命融而为一了。

1985年，他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记女儿的语言日记。女儿满月的时候，他要离开河南信阳的小家到武汉执教，就揣着从口中省下的几文钱买了一台价钱最低、啦啦作响的录音机，把记录任务托付给了病弱的妻子白丰兰和一直帮他理家的侄女王小兰。她们二人，天天记日记，天天录音，李宇明把定期寄来的磁带转写下来，及时把磁带寄回去再用。这样，他写出了《1~120天婴儿发音研究》。此文后来刊登在《心理科学》1991年第5期。女儿出生120天后，质量太差的录音机时常罢工。女儿出生10个月后，一家人在武汉团聚。18平方米的空间，到处是纸片，女儿尊口一

唱，笔行纸上的伴奏即起。李宇明外出开会等，也带上女儿，随时记录。1987年，他侄女出阁，他的大妹到武汉一边求学一边帮他理家，一边帮他记录。如此，前后6年，他们记录下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唐辰）

5

“好笔头”不如“烂记性”

钱乃荣，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

我 1962 年刚跨入大学时，对什么都睁大了眼睛。是濮之珍老师把我带进了语言学的殿堂，培养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不仅她的“语言学概论”课上得娓娓动听，而且对我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特别仔细加亲切。当我有一点新的看法时，她就抓住了在班上要我说出让大家讨论。记得有一次我站起来后连自己的问题都搞不清楚了，濮老师还是鼓励我说出看法并帮我补充把问题讲给大家听。因此，《语言学概论》是一本我记得最好的笔记，上面有完整的听课记录，也有着自已刚学会思考问题时的心血。

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我哪里能料到，一本破笔记，就在沉没了十几年以后，还会派上那么大的用处呢？而且直到现在，我给你们讲课的备课笔记还是以这本笔记的知识垫的底。你们怎么会料到，你现在用功记的笔记，在哪一天也真会起得了大作用呢？”

听了这番话，我的许多学生上课就变得非常会记笔记。他们也

深深体会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谚语的天经地义。

有一次，临近考试前，有两个韩国学生来问我问题。我看到他们手里各人拿着一本复印的笔记。我一看，那是两本字迹非常整齐的笔记，几乎把我上课的全部内容都记了下来，包括我扯出去说的许多即兴内容，我是常常把一些新信息要插进去讲给同学们听的。原来，这分别是班上的两名中国学生的听课笔记。我于是也向她们借来看看，觉得实在是比我自己的讲稿还要清楚和完整，于是复印好了，把这两本复印件改作我现在上课的讲稿。有一次，学校大检查，有一位老教师来听我的课，听完课后上来检查我的备课笔记，他就问我：“人家懒惰的学生到考试时候就会去复印用功同学的笔记，你怎么也用复印的东西？”他的话说得下面的学生都哈哈笑了。

我发觉学生们也不大对。每次上课只管记笔记，脑子变得不用来记知识了。于是我对学生说：你们有些人上课，脑子就像一根传递的电线，把老师说的内容很快输进了笔记本，而脑子里是不进东西的。待到你的笔记本掉了，像储存信息的软盘坏了一样，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对于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来说，我要把那句上海话谚语倒过来说：“好笔头不如烂记性！”

我说，我的老师在讲到“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她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乡下茶馆里讲故事的故事员，往往是一些初识字的人，也有文盲。他们是把故事的情节都记在脑子里，讲的时候许多细节可以说得栩栩如生，循序渐进。但是有些习惯于运用书面语的人，他们只会把条条记下来，脑子就再不去记细节，要他们说一个事情，只有几根鱼骨头，肉是没有的。所以我现在要提倡“烂记性”。

这个乡下故事员的故事，也是濮之珍老师对我们说的。我把它记在我的后来浸透过水的“语言学概论”的笔记里，所以我才没有忘记。我是在复习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重新读到的，但是我已经永远记在脑子里（钱乃荣）

6

邢福义反思

邢福义，1935年5月生，海南乐东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现为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他勤奋严谨，在语法等领域里有杰出的贡献。他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勇于自我解剖。1994年他在《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上发表《尊重事实讲究文品》，对他年轻时候发表的两篇语法研究的小文章进行反思。其中第二篇是说要讲究文品的。

《中国语文》1961年第6期刊登了《“连动式”还是“连谓式”？》邢福义于同年第12期上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战斗组”的署名发表《形式主义一例》，进行讨论，那时候他只有25岁。后来，这篇文章，常常让他反省。时隔33年，他已经59岁了，还发表文章反思说，那篇文章存在问题，一是肤浅，二是拉起大旗作虎皮，文章在标题里就摆出了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末尾又用了一些“革命性”很强、“火药味”很浓的语句。他反思说：“如果说，文章写得肤浅是由于学力不足，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可以原谅，那么，拉起大旗作虎皮便是一种很坏的文品，对于一个学

者来说是任何时候也不可以原谅的。”“现在，我已为人之师，在学风和由学风引起的文品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有必要借对这篇小文章的反思小结，表明有所检讨，并且表示决心和我的学生一起永远引以为戒。”文章的末尾说：“本文的内容，我和我的研究生经常谈到。用武汉话来说，这是‘掉底子’。我愿意跟青年学友们一道，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求进取 求超越。（唐辰）

7

天道酬勤路路通

——访盛玉麒教授

盛玉麒，1948年生于东北，1976年毕业于延边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殷焕先先生。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校执教。现为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教授、博导，全国高校文科CAI（12人）专家组成员、新加坡中文与东方语言信息处理学会会员、山东省语言学会会长。主要著述有《当代汉语流通频度词典》《现代汉语港台词语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根词属性库》等。

盛玉麒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山东大学可谓独树一帜。在读硕士期间，盛玉麒教授深深感受到凝聚在语言文字中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他决心把这一瑰宝发扬光大，而当今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语言文字要发展，就不能隔离在信息网络世界之外。于是，盛玉麒教授就把研究的方向瞄准了信息工程中的前沿课题，在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这一门崭新的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系。

在进行开拓性研究的背后，是盛教授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的治学之路。1994年的春天，盛教授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要求必须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又要接受治疗，又不忍放弃手中的研究项目，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盛教授在卧床的日子里，练就了躺着著书、趴着写字的功夫。在住院十几天的时间里，盛教授写出了60余页的《信息处理用汉语语法规则》。出院以后，由于不能久坐，盛教授就像老僧坐禅一样盘腿坐在电脑前，以减轻病痛。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盛教授每天忙碌到深夜。

当我们在盛教授家采访的时候，客厅和书房之间的门框上搭着的一条毛巾，吸引了我们的视线。见到我们好奇的目光，盛教授就笑着解释说，那是他用来垫着手拔木杠练牵引用的。自从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他就坚持每天做牵引，一天拔上十几次，病痛也可以减轻不少，风雨无阻。将近十年的时间，靠着这样的方式战胜疾病，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盛教授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和，然而，我们听了却心潮起伏，非常感动，深深地敬佩盛教授顽强的治学精神。

“风回路曲终无怨，天道酬勤路路通。”这是盛教授十几年治学之路的生动概括。正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开拓的精神，盛教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果。到目前为止，由他担任负责人，或是以他为主参加研制并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11项，出版教材和著作等成果18种，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100余篇。（郑媛）